

中国书史研究

中国书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古书经折装、梵夹装、旋风装考辨

李致忠

中国古代书籍各种装帧形制的形成、流行与演变，是中国古代书籍史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但迄今为止，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探讨，还仍然没有达到完全能够说清问题的水平。尤其是其中的经折装、梵夹装、旋风装各自形成的历史背景、具体形态，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就更难以阐明，甚至还是一个迷离的疑团。此从下面几家影响较大的论述，就足以看出这个问题的研究现状。

一 前人的论述

五十年代，刘国钧先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讲授中国书史。而后，将讲稿整理成编，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于一九五八年正式出版，名为《中国书史简编》。刘先生在该书中说：“卷子有时长达几丈，展开、卷起都非常费时费事……。于是就有人把一幅长卷折叠起来，成为长方型的一叠……。这就出现一种新式书籍，称为经折装或梵夹装。……可是这样的书容易散开，仍然

不大便利。于是就又有人用一张整纸把经折书的最前叶和最后叶粘连，而将书的右边包裹起来，这样就可以不至散开。这种形式称为‘旋风装’，是经折装的变形。经折装和旋风装大约在九世纪中叶以后就都出现了。”

刘先生是新中国建国以后第一个开创中国书史的奠基人，其功不可泯。也正因为如此，刘先生的这部书影响极大。其实在《中国书史简编》未正式出版以前，刘先生的讲义就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流传。《中国书史简编》问世以后，影响更大。一九六二年，中华书局又出版刘国钧先生的《中国古代书籍史话》；一九六四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又出版刘国钧先生的《中国书的故事》；“文革”以后，由郑如斯同志订补，分别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书目文献出版社，又将《中国书的故事》和《中国书史简编》重出了一遍。足见其影响之大之深之远。但有一点很可惜，就是上面引述的那段关于经折装、梵夹装、旋风装的论述，虽然几经出版，刘先生除了在表述方式上有一点文字改动外，本质上丝毫没有改动。这就是说，刘先生的的确确认为经折装就是梵夹装，或者也可以称为梵夹装。而当着用一张整纸对折，绕过书脊把前后封面粘连起来时，于是经折装就又成了“旋风装”。刘先生的这种认定，从他逝世前与郑如斯先生一道改写，仍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书的故事》中可以得到进一步证明。刘先生在该书中说：“大约在经折装出现不久，有人发现这样容易散开，容易折断，于是就想办法，用一张大纸对折起来，一半粘在书的最前叶，另一半从书的右边包到书背，粘在书的末叶。这样，在拿取时，就不会有散开扯断书页的危险。如果从第一叶翻起，直翻到最后，仍可接连翻到第一叶。回环往复，不会间断，因此，就把它称为‘旋风装’。旋风装是经折装的变形。经折装和旋风装大概是在九世纪中叶出现的。”

不知是否受刘先生的影响，下面诸家关于经折装、梵夹装、

旋风装的表述与认定，则与刘先生大同小异，观点暗合。

一九六二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毛春翔先生的《古书版本常谈》。毛先生在该书中说：“说到宋人蝶装，就要连带说到唐人旋风装。旋风装，由卷子变化而来。卷子本卷舒很不方便，因此唐人于时常翻阅之书，改用旋风装。旋风装的做法，国内学人罕有说得明白的。日本人岛田翰自言见过这种装潢，是取卷子折叠成册，两折一张褙纸，粘于册的首尾即成。”毛先生在这里用岛田翰的说法，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实质上，还是回到了刘国钧先生的说法，即经折装粘包一张整纸就成了旋风装。与此同时，毛先生在介绍《崇宁万寿大藏》刊刻经过时又说：“《崇宁万寿大藏》，北宋元丰三年（1080）开始雕板，至政和二年（1112）竣工，是梵夹本。佛经至是始由卷子而为梵筴。”毛先生对梵夹之“夹”字有疑议，故作脚注以辨之。他说：“梵夹本，应作梵筴本。筴和策字同。夹则为夹持之义，如指贝叶经言，似尚有可说，因贝叶经两端有厚竹片夹持之。但中国书都有底有面，两较厚的纸夹起来的，难道可叫什么夹本么？即古代简策，也有赘简，赘简当有两片前后夹持，而我们但闻有简策，或简册之称，未见有称简夹的。至于我国雕印纸本佛经，形如后世折子，更无夹持之义，应称梵筴本。”这里对毛先生理解、考证的“筴”字正确与否，姑置勿论。从实质上讲，毛先生在这里又把经折装称做了梵夹装。因为梵夹、梵筴、梵篋本质为一，从不同的角度看称谓有异。（详见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而且在《古书版本常谈》中，毛先生在继续介绍的《毗卢大藏》、《思溪圆觉藏》、《思溪资福藏》、《磧砂藏》、《普宁藏》、《明南藏》、《明北藏》、《清龙藏》等名下，都注明是梵筴本。其实这些大藏当中很多还都有传世，是明明确确的经折装，可是毛春翔先生却都把它们称为梵筴本。这样，在经折装即梵夹装的问题上，也就又回到刘国钧先生的说法

上去了。

此后不久，中华书局于一九六四年又出版了陈国庆先生的《古书版本浅说》。陈先生在该书中对古书经折装、梵夹装、旋风装也有如下描述：“隋唐时代，即公元第七世纪，佛教大盛。从国外翻译过来的经典很多，佛教徒为了便于奉诵起见，所有经典，几乎都用经折装。经折装又叫梵夹装。它是把一长幅的纸，向左右反复折叠成一长方形的折子，再在前后加上两张硬纸版作为前后的封面。因为它很象印度来的梵文佛经，所以叫梵夹装或经折装。在经折装出世以后，又有人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进和创造。即把梵夹装的前后封面改为一张整纸，以其一端粘于最前页的左边，另一端向右包到书背而粘在最后一页的左边。这样，便把书的首尾粘连在一起了。在展开的时后，不但没有散落的毛病，并且可以从第一叶翻起，直翻到最后的一叶，再从最后的一叶，翻到第一叶，周而复始，连续不断，有如旋风，所以，人们把它称为旋风装。这种装式的兴起，大约在公元第九世纪中期，它是从卷轴装演进到册叶式的一个过渡形式。”

陈国庆先生的这段描述，是否直接受到刘国钧先生的影响，以及是否失实，无须详加考辨。单说这段描述，是明白无误地将古书经折装直接了当地称做了梵夹装；且又将粘包一张整纸的经折装，又毫无隐讳地说成了旋风装。这样，就在实质上重蹈了刘国钧先生的复辙。

一九七五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名誉教授钱存训先生的《中国古代书史》。钱先生在该书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书籍的卷轴形式，一直延续使用到九世纪唐代末叶才被折叠的形式所取代。自此而后，中国书籍的形式便逐渐演变。最初的折叠式，称为‘旋风装’或经折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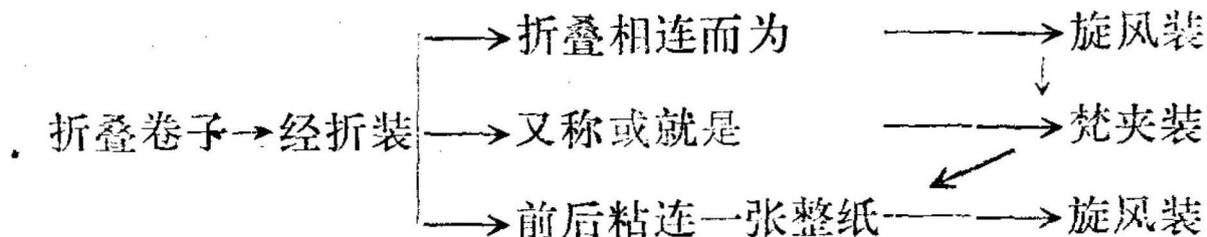
钱先生在该书所附图版二五唐代经折本的旁注中还说：“敦煌发现《入楞伽经疏》，计二百十一叶，折叠相连为‘旋风装’。

钱先生的说法自有特点，是把经折装与旋风装合二为一，即经折装就是旋风装，反过来，旋风装当然也就是经折装。如果把钱先生的意思演化为公式，那就应该是：唐代最初的折子本 = 旋风装 = 经折装。这比上述几家的说法更简单，就是说经折装连包一张整纸也不必，就可直接称为旋风装。

一九八〇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萧振棠、丁瑜合著《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一书。二位在该书中说：“对于较长的卷轴，要检阅当中的某一句某一段，往往要卷来卷去，很不方便。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有人发明把卷子折成约11至12厘米宽的长方型纸叠。在纸叠的最前面和最后面裱上较厚的纸，作为书衣（书皮）。这一装裱书籍技术的改进，使书籍发展到了一种新的形式，称为‘折装’，也称为‘经折装’或梵夹装。这是因为在公元七、八世纪时的隋唐时代，佛教的经典，大多数都采用这种装裱形式，故有经折装的名称。……折装的书籍普遍使用之后，有人觉得这种装裱形式的书极易散开，于是又加以改进。即把卷子折叠成册，然后用一张比折子宽一倍的厚纸，从当中对折起来，上半折粘于卷首，后半折粘于卷尾，折叠时象一册平装书，全部拉开如同一个大的纸套。翻阅时既不会有散开扯断的缺点，还可以从第一叶翻起，直翻到最后一叶，并仍可继续由最后一叶翻到最前面；周而复始，不会间断。这种回环往复翻阅的书，宛转如旋风，就叫它作‘旋风装’。”

这段论述，除在文字表述上有些不同外，在观点上没提出什么新内容、新看法。实质上，他们还是袭用了刘国钧、陈国庆等人的说法，仍是把经折装与梵夹装等同了起来；而把经折装前后粘包一张整纸，就又与旋风装混同了起来。

综合前边引述的所有这些论述，若是用图象表示，似乎可以概括为：



这个图象并不是什么科学图表，而是为了客观反映前人对这几种装帧形式议论的实际状况。本来，做为个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观点，对与错都没有什么可非议的，因为大家都在探讨嘛。问题是几十年来大家互相沿袭，人云亦云，这就形成了极为广泛、极为深远的影响，甚至影响到词书、百科，这就很值得注意了。因此，我下面要加以考辨的，主观意愿绝不是要指斥那些位前辈的疏陋、失实和错误，而是为了探讨和研究问题，万一能说对，也许还能帮助诸前辈尽早挽回一点影响。当然，要是说不对，或是说得不完善，那就诚恳地希望得到诸家的批评、指正和补充了。

二 经折装

经折装这个名称的出典，迄今尚难稽考。但经折装来自卷子装，或者说它是对卷子装的改造，大概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佛教自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以后，中经三国、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已蔚为大观。竹木简行用时期佛经翻译的情况如何，这里无须细考。单说将翻译过来的佛教经书写在缣帛和纸张上，并同彼时的其它书籍一样，也采取卷子装的事例，则是有案可稽的。

《高僧传》卷一，记载摄摩腾“译四十二章经，一卷。初緘在兰台石室。”我们知道，竹木简时期的书籍，其计量方法多以篇、编为单位，这是就竹木简书编连特点而命名的。待到使用缣帛和纸张来制造书籍，一篇、一章、一编写完，也常常告一段

落，作为一个单元。而后适应缣帛、纸张的特点，采取卷起来收藏的办法，于是“卷”就成了帛书和纸书的计量单位。摄摩腾译出的四十二章经，究竟是用什么文字载体写的虽然没有说明，但其计量单位则是“一卷”，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其书写材料不外缣帛和纸张。然造纸术的改进和纸张的逐渐行用，当在汉和帝元兴元年（105）以后，因此，摄摩腾所译的四十二章经，更大的可能是书写在缣帛上。

《高僧传》卷四，记载朱士行以为汉灵帝时竺佛朔译出的《道行经》，即小品之旧本，文句简略，意义未周。于是“誓志捐身，远求大本。遂于魏甘露五年（260）发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阆，得梵书正品凡九十章……。”后由竺叔兰译为晋文。“至太安二年（303），支孝龙就叔兰一时写五部，校为定本，时未有品目。旧本十四匹缣，今写为二十卷。”这就进一步证明梵经译汉之后，使用缣帛书写，并采取卷子装的形式，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了。

《续高僧传》卷一，记载“始梁武之末，至陈宣初位，凡二十三载，所出经律论传六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余有未译梵本书，并多罗树叶，凡二百四十夹。若依陈纸翻之，则列二万余卷。”此为梵经译汉之后，使用纸张书写，并采取卷子形式的明证。

《续高僧传》卷二，记载隋文帝时沙门明穆彦琮“重对梵本，再审覆勘，整理文义。昔支昙罗什等所出《大集》卷轴，多以三十成部”。

《续高僧传》卷三十八，记载隋代沙门法泰“乃精勤写得《法华经》一部，数有灵瑞，欲将向益州装潢。”中途失水复得。及“至成都装潢，以檀香为轴，表带及袞并函，将还本寺，别处安置。”

《续高僧传》卷五，记载唐京师大慈恩寺释玄奘“所获经

论，奉敕翻译，见成卷轴，未有铨序，伏惟陛下睿思。”

《续高僧传》卷二十六，记载唐开元间沙门玄览能“写经三千余轴。”

《续高僧传》卷三十八，记载唐释空藏“乃钞摘众经大乘要句以为卷轴。纸别五经三经，卷部三十五十，总有十卷。”

《宋高僧传》卷三，记载车奉朝出使到龟兹国莲华寺，“祈请开译梵夹，传归东夏。”莲华寺僧精进欣然乐许。“遂译出《十力经》，可用东纸，三幅成一卷。”

所有这些记载，都无可辨驳地证明，梵经译汉之后，更多地是采用纸张书写，而且普遍地采用了卷轴装，或者说是简易无轴的卷子装。这一点，不但上述的文献记载可为明证，从敦煌石室发现的，迄今仍分藏在英国、法国、苏联、日本以及中国的几万件唐五代以前的写经，绝大多数也都是卷子装。其实，唐及唐以前，不仅仅是翻译过来的佛经采用卷轴装，首先还是中国固有的书籍采用卷轴装，梵经译汉之后，仿效了这种装帧。所以这是彼时最流行的书籍装帧形式。

唐代韩愈在《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中说：“邛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

北宋欧阳修在其《归田录》中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元朝吾衍在其《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明朝都穆在其《听雨记谈》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清朝高士奇在其《天禄识余》中也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所有这些，又都可以进一步说明一个历史事实，这就是唐及唐以前，无论是翻译过来的佛经，或是中国固有的经史四部，普遍的采用了卷轴装。或者说，彼时书籍的装帧形式，最盛行卷轴装。

大凡事物的发展规律就是这样，当着某种事物发展到鼎盛时期，一方面表明了社会人们对它的普遍需要；但随着社会需要的

进一步发展，这种事物也就容易暴露出其固有的弱点。于是，人们又对它加以改造，使之更加进步，更加适应人们的需要。中国古书装帧形制的演变，也是沿着这样一条事物的发展规律，逐渐演化的。

我们前边说过了，到唐代为止，最盛行的书籍装帧形式还是卷子装；但到唐代为止，佛学在中国的发展也达到了鼎盛时期。一方面是僧尼遍于域中；另一方面翻译过来的佛经又以卷子装的形式盛行于域中。僧尼遍于域中，意味着善男信女诵经的普遍；卷子装盛行，则意味着它对僧尼们诵经的不便。因为佛弟子念经，要盘禅入定，正襟危坐，以示恭敬与虔诚。善男信女们念经时的这种姿态，卷子装之不便可想而知。任何一种纸卷，包括佛教经卷，卷久了，都会产生卷舒的困难。由于卷久的惯性，念过去的部分，经卷会自动由右朝左卷起；未念的部分，经卷又会自动由左向右卷起。这种情况，如果不随时调整镇尺的位置，经卷就会从左右两个方向向中间卷起，使人无法就读。试想，如此麻烦不便的卷轴装式，怎么能适应佛弟子那种正襟危坐、盘禅入定的读经方式呢？因此，一场对流行许久的卷子装的改革，首先在佛教经卷上发生了。这就是将本为长卷的佛经，从头至尾地依一定行数或一定宽度连续左右折叠，最后形成长方型的一叠，再在前后各粘裱一张厚纸封皮，于是一种新的装帧形式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经折装。正如元朝吾衍和清朝高士奇所揭示的那样，经折装的出现，完全是针对卷子装卷舒之难的弊病而发生的。元朝吾衍在其所著《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复为簿帙。原其初，则本于竹简、绢素。”清朝高士奇在其所著《天禄识余》中也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其后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乃分为簿帙，以便检阅。”这两位不同时代的古人，揭示了同一个真理，即折子装，或者说是经折装，的确来源于卷子装。

经折装由卷子装演化而来，已如上述。但这还只是文献记载。现在再引证两件实物，作进一步证明。

一九七五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美国钱存训教授的《中国古代书史》。钱先生在该书中披露了一种唐代经折本图版，经名为《入楞伽经疏》，凡二百十一叶，原出自敦煌石室。其装帧形式即是左右相连折叠的经折装。此为唐代佛经出现经折装的实物证明。它不但可以证明上述的文献记载绝非诬论，而且以雄辨的实物，进一步证明唐代在佛学盛行的情况下，佛经由普遍流行的卷子装开始演化为折子装，即经折装了。

英人斯坦因在其《敦煌取书录》中还描绘过一件五代印本佛经的装式。他说：“又有一小册佛经，印刷简陋……。书非卷子本，而为折叠而成……。折叠本书籍，长幅接连不断，加以折叠……。最后将其他一端悉行粘稳，于是展开以后甚似近世书籍。是书时为乾祐二年，即纪元后九四九年也。”斯坦因看到并描绘过的这件实物，表明印刷品的佛经，在五代时期也有的采取了经折装式。

我们知道，书籍的装帧形制，是随着书籍生产材料和生产方式的变化，以及社会人们对书籍的使用频率而缓慢演化的。经折装的出现，只能在纸书盛行的前提下形成。不是以纸为文字载体的其它任何材料的书，都很难想象采取经折装。因此，它与梵夹装迥然不同，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三 梵夹装

我们在前面引录的前人论述中，诸前辈已把经折装混为梵夹装、视为梵夹装，乃至直接称为梵夹装。由于这种说法长期广泛的流行，直至影响到很权威的词书。例如《辞海》未定稿梵夹装条就称：“梵夹装，即经折装。佛教经典多用此式，故名。”而新

《辞海》此条，则原封未动地移录了未定稿《辞海》的说法。而新《辞海》经折装条仍称：“经折装，也称‘梵夹装’。图书装订名称。”可见把经折装看成就是梵夹装，或把梵夹装看成就是经折装，已经成了多年的定论，毋庸置疑了。问题是否真的如此，现在考辨如次。

梵夹装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更不是古代中国纸质书籍的装帧，而是专指古印度书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梵文佛教经典的装帧。

印度是佛教的发祥地。产生在印度的佛教经典，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书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故又称为贝叶经。

据《大唐西域记》卷十一恭建那补罗国（属印度境）条记载，说那补罗国“城北不远有多罗树林，周三十余里。其叶长广，其色光润，诸国书写，莫不采用。”

《大唐西域记》尚书左仆射燕国公序文称赞玄奘说：“于是词发雌黄，飞英天竺，文传贝叶。”

《酉阳杂俎》卷十八称：“贝多，出摩伽陀国，长六、七丈，经冬不凋。此树有三种：一者多罗婆（一曰婆）力义贝多；二者多梨婆（一曰婆）力义贝多；三者部婆（一曰婆）力义多罗梨（一曰多梨贝多）。并书其叶，部阔一色，取其皮书之。贝多是梵语，汉翻为叶贝多婆（一曰婆）；力义者，汉言树叶也。西域经书，用此三种皮叶。若能保护，亦得五、六百年。”

《旧唐书·南蛮传》称：“堕婆登国在林邑南……。其国种稻，每月一熟。亦有文字，书之于贝多叶。”

《新唐书·西域传》称：“中天竺……有文字，善步曆，学《悉昙章》，妄曰梵天法。书贝多叶以记事。”

所有这些记载，可以充分证明，古印度，甚至包括地处热带的南亚，都有利用贝多树叶做为书写载体的习惯，印度的古梵文佛教经典就更是普遍采用这种树叶书写了。

我们在前面说过，书籍的装帧形制，只能视书籍的制做材料而采取相应的方式。古印度佛经既是采用狭长硕大的贝多树叶书写，其装帧形制也就只能适应这种材料而采取相应的方式，这就出现了所谓“梵夹装”。何谓梵夹装？如果用最通俗的语言加以诠释，那就应该就是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的佛教经典而采用夹板式的装帧。此从古人常把“夹”做为古印度佛教经典的计量单位或称谓，可以进一步得到证明。

隋朝杜宝在其《大业杂记》中，对梵夹装的来历曾有过一段形象生动的描绘。他说东都（今洛阳）“承福门即东城南门。门南洛水有翊津桥，通翻经道场。新翻经本从外国来，用贝多树叶。叶形似枇杷，叶面厚大，横作行书。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今呼为梵策。”杜氏这段描述比较明确地告诉我们，梵夹装是隋朝人对传入中国的古印度书写在贝多树叶上梵文佛教经典装帧形式的一种形象称呼。其具体的装帧方式，盖是将书写好的贝叶经，视经文段落和贝叶多少，依经文的次序顺序排好，形成一罗，然后用两块经过刮削加工的竹板或木板，将排好顺序的贝叶经上一块下一块地夹住，然后穿洞系绳。缘其以竹木板上下相夹，又是梵文佛教经典，故称为梵夹，也就是我们这里讨论的梵夹装。这是就隋人杜宝的描述，导出来的我们对梵夹装的装帧方法的理解。这种理解对不对呢？还需要加以证明。

《资治通鉴》卷二十五唐纪，唐懿宗咸通三年（862），说唐懿宗“奉佛太过，怠于政事。尝于咸泰殿筑坛，为内寺尼受戒，两街僧尼皆入项；又于禁中设讲席，自唱经，手录梵夹。”元朝胡三省在给《资治通鉴》作注时，于“梵夹”二字下称：“梵夹者，贝叶经也。以板夹之，谓之梵夹。”胡三省在这里把“梵夹”与“贝叶经”看成是一种东西，或者说他是以“贝叶经”来训释“梵夹”，反过来当然也可以“梵夹”来训释“贝叶经”。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梵夹装与贝叶经是互为因果不可分离的。

换句话说，就是梵夹装只能指贝叶经而言。他下面的两句话很重要，是继续说明他为什么把“梵夹”训释成“贝叶经”的。原因是这种贝叶经“以板夹之”，故“谓之梵夹。”这就跟我们上面的解释相一致了，或者说我们上面的解释是有古人之证的。胡三省所处的时代不是很古，但毕竟也是十三世纪的人物。加之此人学识渊博，学风严谨，故其对梵夹的训释当是可信的。近人丁福保所编《佛学大辞典》梵夹条亦称：“梵夹，杂名。又曰经夹，又云梵篋，多罗叶之经卷也。《通鉴》‘唐懿宗于禁中自唱经，手录梵夹’。注曰‘梵夹，贝叶经也，以板夹之。’”足见丁氏也信胡三省的解释为不诬。故其在梵篋条继续解释说：“梵篋，杂名，多罗叶之经卷。贝叶重叠，以木板夹其两端，以绳结之。其状恰如入于箱，故云梵篋。”这样，问题就更清楚了。即所谓梵夹，简单明了地概括，就是用竹木板夹装起来的贝叶经夹。这一点，不仅理论上的如此解释可信而无疑，现存于世的贝叶经，也以实物实装的形态，进一步证明了这种解释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北京图书馆、民族文化宫都还藏有贝叶经，其装帧形式正是两板相夹贝叶，中间穿孔结绳。例如北京图书馆所藏僧伽罗文的贝叶经，就是这种形式。

讨论至此，我个人认为结论似乎已不点自明了。即所谓梵夹装，是古代中国人对从西域、印度传进来、用贝多罗树叶书写的梵文佛教经典两板相夹形式的一种称谓。或者说是古代中国人对从印度传进来的两板相夹形式梵文贝叶经的专门称谓。这一点，还可以从以下的古文献资料得到充分的证明。

《续高僧传》卷一称：“始梁武之末，至陈宣初位，凡二十三载，所出经论记传六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余有未译梵本书，并多罗树叶，凡二百四十夹。”

《续高僧传》卷二称：“大业二年（606），东都新治……。敕于洛阳上林园立翻经馆以处之。供给事隆，倍逾关辅。新平、

林邑所获佛经，合五百六十四夹，一千三百五十余部。”

《大唐西域记》卷十二称唐玄奘所取回佛经为“大乘经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论一百九十二部；上座部经律论一十四部；大众部经律论一十五部……，凡五百二十夹，总六百五十七部。”

《宋高僧传》赞宁序称：“浮图揭汉，梵夹翻华。”

《宋高僧传》卷一称：“释不空……至天宝五载（746）还京，进狮子国王尸罗迷伽表，及金宝瓔珞、般若梵夹……等”。

《宋高僧传》卷三称：“释满月者，西域人也。……开成（836—840）中进梵夹”。

《宋高僧传》卷三又称：“翻梵夹须用此方文籍者，莫招滥涉儒雅之过乎”。

《宋高僧传》卷三还称：“莲华精进。本屈支城也。即龟兹国，亦曰立兹，正曰屈支。时唐使车奉朝到彼土城西门外，有莲华寺。进居其中，号三藏苾芻。奉朝至诚，祈请开译梵夹，传归东夏。进允之，遂译出《十力经》。”还称悟空迥及龟兹，“居莲华寺，遇三藏法师勿提提羸鱼，善于翻译，空因《十力经》夹请翻之。寻至北庭，大使复命空出梵夹，于阆三藏戒法为译主，空证梵文。”这里的悟空，是京兆云阳人，俗姓车氏。尝随使出，至健陀罗国，忽生重病，滞留在彼。他在病中发愿，痊愈当出家。后至西印度，“受梵本《十地回》、《向轮》、《十力》三经，共一夹。”

《宋史·外国传·印度》称：“乾德三年（965），沧州僧道圆自西域还，得佛舍利一水晶器、贝叶梵经四十夹来献。”

又称：“开宝（969—976）后，天竺僧持梵夹来献者不绝。”

又称：“至道二年（996）八月，有天竺僧随船舶至海岸，持帝钟、铃杵、铜铃各一，佛像一躯，贝叶梵书一夹。与之语，不晓。”

上面这些文献资料，可以雄辩地证明：古代中国人关于梵夹

的称谓，是专指从印度传进来的、未经翻译的、书写在贝叶上、而又用两板相捆夹的梵文佛教经夹而言的。它与“浮图揭汉，梵夹翻华”之后的汉文佛经，书写在纸张上，装成卷轴，而后由卷轴加以折叠而形成的所谓经折装，没有任何相同之处，却有本质上的区别。两者不能同日而语，相提并论，混为一谈。

如此说来，那么中国到底有没有，或类似梵夹装的书籍装帧形式呢？这也是有的，或者说有类似的东西存在。北京图书馆珍藏一种五代时期回鹘文的《玄奘传》，其制作材料虽已是纸，但却采取了单叶长条双面书写的形式，这显然是模拟印度的贝叶经。其装帧方式亦是集数叶为一叠，每叶中间都画有红色圆圈，这显然也是模拟贝叶经穿洞夹板结绳的遗迹。这种装帧形式怎么称呼，不得而知。是否因为它模拟印度贝叶经的梵夹装，也就可以称为梵夹装呢？不敢断言。但至少可以表明，在中国古代纸书盛行以后，是曾经有过单叶纸张而双面书写或印刷，而后集数叶为一叠，上下两块板相夹而成书的装帧形式的。特别是后世印刷的藏文经，很多都是采取这种形式的，存世的也并不罕见。因此，我个人认为，如果说在中国古书的各种装帧形式中，有过梵夹装，或类似梵夹装的形式存在和流行过，那也只能是指象五代回鹘文《玄奘传》及后世藏文大藏经这种形式，而绝不是经折装这种形式。因为经折装最初是由折叠卷子而来。尽管其外部形态也是长条状，但内部还是彼此相连，首尾衔接。而梵夹装不但是从印度传来的贝叶经夹是由彼此不相连缀的众多贝叶依次罗起而成，就是中国古代用单叶纸张而双面书写或印刷，而后依次罗起，用两板相夹而成的所谓模拟的梵夹式，其明显的特点，或者说是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这种装帧是装帧的单叶，且根本不是来自卷子装。可见，不加任何分析地把经折装就称为梵夹装，或把梵夹装径直地就视为经折装，都是缺乏根据的。

四 旋风装

从前边引证的前人论述中，不难看出前人不但把两不相干的经折装与梵夹装搞混，把它们说成是一种装帧形式的两种不同称谓；而且还把经折装前后粘包一张纸，就又视为称为旋风装，或者干脆迳直地又把经折装视为称为旋风装。例如钱存训先生，他在自著《中国古代书史》图版二五的旁注中就说：“唐代经摺本。敦煌发现《入楞伽经疏》，计二百十一叶，摺叠相连为‘旋风装’。”足见在中国古代书籍史的研究中，不但经折装与梵夹装搞混了，同时经折装与旋风装也搞混了。事实上，旋风装的出现有自己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它不是在经折装的基础上产生的，更不是人们为了弥补经折装容易扯断的弊端，而前后粘加一张整纸演化出来的。它是在卷轴装的基础上，为了解决卷轴装翻检的不便而创造出来的。它与经折装的装帧方法和装帧形式风马牛不相及，完全是各不相干的两回事。

我们在前边讨论经折装的时候，曾引证描述过唐及唐以前卷子装盛行的情况，这里不再赘述。但是，唐代在卷子装盛行的同时，学术文化也高度发展。特别是诗歌的发展，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把整个唐代社会装点成了诗歌的黄金时代。

众所周知，诗歌的发展，特别是近体律诗的发展，一方面要求要有严格的韵律，另一方面遣词造句、运用掌故又要求要典雅有据。可是任何一个诗人，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这样的“诗仙”、“诗圣”，也不可能一切都知、一切都懂、一切都记在脑海里。他们起韵赋诗、运用典故，也常常需要查检某些工具性质的图书。为了给诗人提供这种查检的方便，唐代社会应时地出现了两方面的著作。一方面是供诗人查检掌故用的类书开始涌现，如《初学记》、《北唐书钞》、《白氏六帖》、《群书治要》

等；另一方面则是备诗人起韵赋诗时检阅格律的韵书逐步完善。本来，隋朝已有陆法言的《切韵》行世，但入唐之后随着诗歌的兴盛，这部《切韵》就显得不能适应。故到唐高宗仪凤二年（677），就有长孙讷言起而为陆氏《切韵》作笺。又过三十余年，就又有王仁昫起而为陆氏《切韵》作刊谬补缺。再过三十余年，孙愐索兴另撰新的韵书，这就是所谓的《唐韵》，使韵书逐步臻于完善。

中国古代的类书与韵书，其性质与功用类乎现代的工具书，是备经常检用的。性质与功用既是如此，这就产生了要求其装帧形式如何才能适应这种翻检方便的问题了。

可是，我们在前边揭示过了，唐代书籍最盛行的装帧形式还是卷子装。这种装帧形式的形成与流行，正如元朝吾衍《闲居录》所揭示的那样，“原其初，则本于竹简、绢素。”这就是说，纸书的卷子装是源于竹简编连之后卷起，是源于帛书写好之后卷起的形式而形成的。因此，卷子装的形成与流行，是渊源有自，继往开来的。但卷子装有其自身固有的弱点，这就是卷舒极为不便，查检其中的资料尤难。特别是象唐代出现的类书与韵书，论其功用，是备经常翻检；可是从当时盛行的书籍装帧形式又是卷子装。一方面是要经常翻检，查找方便；另一方面当时流行的卷子装又制约着这种经常翻检、查找方便。这样，两者就形成了极为尖锐的矛盾。怎么办呢？如何才能解决这种矛盾呢？这就是古书旋风装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

北宋欧阳修在其《归田录》卷二中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

陶宗仪《说郛》引宋程大昌《演繁露》也说：“古书皆卷，至唐始为叶子。”

南宋张邦基在其《墨庄漫录》卷二中也说：“其后在相国寺庭

中买得古叶子书。”

上面这几段宋朝人的说法，表明一个历史事实，即在唐代书籍盛行卷子装的情况下，遇到有备经常检用的书籍时又怎么解决装帧形式问题呢？按照欧阳修和程大昌的说法，那就是要采取写叶子的办法，或者说是“以叶子写之”的办法。但是这种树叶写好之后又怎么处理呢，到底装帧不装帧呢？程大昌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欧阳修也只说了一句“其制似今策子”。但这句话至关重要，因为它透露了唐代书籍的一种新的装帧式样的信息。这种式样，欧阳修说它的形制类似当时书籍流行的册子。欧阳修是北宋初期的人。他所生活的时代，书籍的生产方式很多已经采用雕板印刷了。雕板印刷的书叶，要受雕板特点的制约，不可能象手写纸卷一样，毫无间断地写下去。印制的书叶既是以板为单位，并且均为边栏界行所规范，那么其装帧方式就无须再把每版书叶的左右边栏裁去，而后逐叶粘连，仍采取卷子装的办法了。那么北宋时期到底采取什么办法呢？很可能就是集数叶为一叠，而后彼此粘连书脊而成册的办法。这种册大概就是我们所说的蝴蝶装。蝴蝶装的古书，从外观上看，很似簿帙，很似现在的书册。欧阳修所说唐代“以叶子写之”的书籍装帧，“其制似今策子”所似者大概似的就是这种蝴蝶装的书册。然而似还毕竟只是似，还远远不能说就是，所以唐代“以叶子写之”的书籍到底怎么装帧，尚须进一步地加以探索。

今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一件特殊装帧的古籍，就是《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这件特级文物，其装帧形式对研究什么是古书的旋风装，是一件绝无仅有、十分难得的实物资料。

《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原书卷端题名为《刊谬补缺切韵》，相传为唐代成都古仙人吴彩鸾书写的唐韵。后来因说吴彩鸾书写无确据可考，故由故宫博物院在影印此书时改题《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

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成书年代，史无记载；王仁昫的行实事迹，亦很难稽考。但唐兰先生据书中所题“朝议郎行衢州信安县尉王仁昫字德温新撰定”之衔名，考证天宝元年（742）已改衢州信安县为衢州信安郡，此书仍称衢州信安县，因定此书之作必在天宝元年以前。又据书序中有“大唐龙兴……”的题法，考证武则天末年才传位给中宗李显，神龙元年（705）始复国号曰唐，才可称“大唐龙兴”，因定此书之作又必在神龙二年（706）之后。又据书中二十五“铕韵”中的“显”字下，小字加注“今上讳”三字，推定其为回避唐中宗李显的嫌名。因此，王仁昫给《切韵》作刊谬补缺，必在中宗之世。唐兰先生的这一点考证，十分精当，解决了王仁昫作《刊谬补缺切韵》的时代问题。如果顺着这条线索细考，还能将此书的撰定确定在更为确切的时限之内，既讳李显嫌名，又题“今上讳”，则无疑就在中宗在位的年限内。唐中宗李显曾在嗣圣元年（684）登基，然年内就被李旦代替；又在年内被武则天代替。因此，李显第一次登基的时间不可能是王仁昫为《切韵》作刊谬补缺的时间。因为那时大唐天下还在李氏手里，尚未被武氏篡夺，谈不上“大唐龙兴”，既称“大唐龙兴”，指的当然应该是武则天还政后的李显。李显第二次登基是在神龙元年（705），在位凡五年。因此，王仁昫作《刊谬补缺切韵》必在神龙元年至景龙四年（705—710）之间，否则就不会在“显”字下注为“今上讳”三字。

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全书共五卷，凡二十四叶。除首叶是单面书写外，其余二十三叶均为双面书写，所以共是四十七面。每面三十五行，自四十“耕”起，为每面三十六行。每叶高25.5cm，长47.8cm。其装帧方式，是以一幅比书叶略宽的长条纸作底，除首叶因系单面书写而全幅粘裱于底纸右端之外；其余二十三叶，因均系双面书写，两面有字，故以每叶右边无字空条处，逐叶向左鳞次相错地粘裱在首叶

末尾的底纸上。看去错落相积，鳞次櫛比，好似龙鳞。收藏时，与卷轴装相反，从首向尾卷起，外表仍是卷轴的装式；但打开来翻阅时，除首叶因全幅粘裱于底纸之上，不能翻动外，其余二十三叶，因仅将右边无字窄条处粘于底纸之上，故能和阅览现代书籍一样，逐叶翻转。这种装帧形式，既保留了卷轴装的外壳，又解决了翻检必须方便的矛盾。可谓独具风格，世所罕见。

问题是故宫博物院所藏这件《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装帧形式，到底应该怎么称呼，它是否就是中国古书的旋风装，还需要进一步加以考证。

我们在前边曾经引用过欧阳修《归田录》中的话，但没有引全。现在为了说明问题，不妨再引全一些。他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如吴彩鸾唐韵、李郢彩选之类是也。”欧阳修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凡经常有备检用的书籍，采取卷轴装不便翻检，故写成一叶一叶的，然后装成类似他所生活北宋时代流行的书册一样。这话在我们后人想来还是十分抽象，难以琢磨。然他后边所举的两例，“如吴彩鸾唐韵、李郢彩选之类是也。”则是非常具体了。原来他所说的“其制似今策子”，具体指的就是今故宫博物院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这一类的装帧形式。

王氏《刊谬补缺切韵》，过去一直被说成是吴彩鸾书写的《唐韵》，直到清代《石渠宝笈》著录王氏这部《切韵》时，仍题“吴彩鸾书《唐韵》”。可见前人所谓吴彩鸾书《唐韵》，当不是具体指孙愐的《唐韵》，而是对唐代韵书的概称，实际指的就是《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故欧阳修举列说的吴彩鸾唐韵，指的也就应该是王氏这部《刊谬补缺切韵》。足见欧阳修是见过这件东西的，并且作了如上的议论与描绘。只可惜他未明确指出这种装帧形式究竟叫什么名字。

到了南宋初年的张邦基，则在自著《墨庄漫录》卷三中说：“成都古仙人吴彩鸾善书名字，今蜀中导江迎祥院经藏，世称藏中《佛本行经》十六卷，乃彩鸾所书，亦异物也。今世间所传唐韵犹有，皆旋风叶。字画清劲，人家往往有之。”这段话中的其他文字与本文没多大关系，惟“今世间所传唐韵犹有，皆旋风叶”至关重要。它表明张邦基已把所谓吴彩鸾书《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这类装帧形式，直接了当地称为“旋风叶”了。

“旋风叶”是什么意思？如果是未经装帧的一叶一叶的单叶，那就只能称为叶子，根本谈不上什么旋风叶，既称“旋风叶”，恐怕就应该指的是经过装帧而具备一定形式的书叶。足见至南宋初年，已有人把《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这种装帧形式称为旋风叶了。

至元朝王恽，他在自著《玉堂嘉话》卷二中对这部韵书的装帧形式又有如下的描述：“吴彩鸾龙鳞楷韵，后柳诚悬题云：‘吴彩鸾，世称谪仙也。一夕书广（广疑唐之误）韵一部，即鬻于市，人不测其意。稔闻此说，罕见其书，数载勤求，方获斯本。观其神全气古，笔力遒劲，出于自然，非古今学人所可及也。时大和九年九月十五日题。’其册共五（五疑二之误）十四叶，鳞次相积，皆留纸缝。天宝八年制。”

这段记载可以说明三个问题：一是王恽所见到的所谓吴彩鸾书唐韵，就是今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之《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此由明初宋濂的题跋可以证之。今故宫博物院所藏之《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原件，卷尾有宋濂亲笔题跋。跋称：“右吴彩鸾所书《刊谬补缺切韵》，宋徽庙用泥金题签，而前后七印俱完。装潢之精，亦出于宣和内匠，其为真迹无疑。余旧于东观见二本，纸墨与之正同。第所多者，柳公权之题识耳，诚希世之珍哉！”这说明元朝王恽与明初宋濂所见到的是同一件东西，即带有柳公权题识的那一件。今故宫所藏原件宋濂手跋犹

存，而柳公权题识已佚，诚可惜也。

二是称“其册共五十四叶，鳞次相积，皆留纸缝。”其描述的装帧形象为“鳞次相积”，亦与今故宫所藏原件完全一致。关键是他这里直接称“其册共五十四叶”，可见这种装潢亦可称为“册”。宋人侯延庆的《退斋笔录》尝记载“哲宗以一旋风册子手自录次”大臣的建议。过去对这“旋风册子”一词实难费解。现在把南宋张邦基所称的“旋风叶”，与元人王恽对同一件东西所称的“册”结合起来，则“旋风册子”就比较好理解了。其具体的装帧形象，大概就象是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那样。

三是王恽在他那段话的末尾有个“天宝八年制”的脚注。按唐兰先生的考证，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成书当在天宝元年以前。这就是说，在成书之后，有人抄写流传，而在天宝八年制成了这种装帧，此在时间顺序上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至于宋濂手跋中所说“装潢之精，亦出宣和内匠”，盖指宋宣和时由内府高手重新装裱过，而不是始由他们制成这种装潢。

到了清初钱曾，也见过这件东西。他说：“吴彩鸾所书唐韵，余在泰兴季因是家见之，正作旋风叶卷子，其装潢绝非今人所晓。”（《函芬楼烬余书录》）钱曾、季因是都是清初有名的藏书家，钱氏特别注意到了它的装潢，把它又称为“旋风叶卷子”。的确是，这种装帧打开时，书页鳞次相积，可以逐叶翻阅；收起时，从首向尾卷起，外观完全还是卷轴装。

从上述诸家记载，可见从北宋、南宋，一直到元、明、清，诸家对《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装潢，虽然描绘、称谓不尽相同，但把这种装帧称为“旋风册子”、“旋风叶子”、“旋风叶卷子”，则是在“旋风”二字上统一了。可见把这种装帧式样称为中国古书的“旋风装”，当是不乏古人之证的。

且考自然界旋风的形象特征，亦是因某处气压低，四周空气

向一处注流而形成螺旋式旋转的风。这种风的特点，就是空气分若干层次前后朝一个方向旋转。它的立体形象就仿佛若干张鳞次相积卷起的芦蓆，外观是个圆筒，内部层次相错。前人之所以称《唐写本王仁昫刊谬缺补切韵》的装帧为“旋风叶卷子”，大概就是因为这种装式使书叶分若干层次朝一个方向旋转，很象自然界的旋风。因此，古书的旋风装应当是指这种装帧的本身就象旋风；而不应该是指那种前后粘包一张整纸的经折装，在翻阅时周而复始、回环往复，于是经折装就成了旋风装；更不是指折叠相连的经折装就是旋风装。旋风装有自己的独立形态，有自己产生的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旋风装与经折装虽然都是在唐代卷轴装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但两者产生的社会原因不尽相同。经折装的产生是为了解决佛弟子念经方便而彻底改造了卷轴装；旋风装的产生是为了解决文人学士检阅书籍的方便，而在保留卷轴装外壳的前提下，改变了内涵的装式。因此，经折装与旋风装可谓产生于同源，而流向迥异，形式亦完全不同，两者亦不能混为一谈。

上面关于经折装、梵夹装、旋风装的考辨，仅是个人的管见，目的在于探讨。疏陋和错误之处，祈望批评指正。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

